

人物

2

RENWU ★ 1983

108869

人物 双月刊

著名经济学家孙冶方

邓加荣 3

探索对虾奥秘的人

刘元林 18

“香”情

沈夕春 吴志峰 38

“人梯”颂

王安 141

{ 人物信箱 } 一九五五年授衔的上将简介

135

将军笔下的革命春秋

姚远方 44

——杨成武和他的战争纪实文

徐老的“诗教”

冯资荣 55

写在烟盒纸上的诗

——访廖沫沙同志



33

{ 橄榄果 } 马克思说过

201551454

78

魂归中华

——记恭美女画家杨令弟

商一仁 89

嘎伦—叛军司令—政协委员

——拉鲁·才旺多吉

袁自力 郑慧新 刘济民 57

{ 求真 }

李贺的《高轩过》不是七岁时作

{ 小集 }

容闳是第一个留学生吗?

140

赵丹的新疆之行

王为 112

我的生命在舞台上(续)

陈素真 100

{ 怀 }

忆胡子婴同志

冯和法 26

{ 念 }

马寅初校长二三事

梦 184

{ 集 }

先父许寿裳的晚年岁月

许世玮 80

许寿裳先生的侧影

李霁野 85

{书简} 顾颉刚给女儿顾颉的信

74

独创手写杂志的廖平子

陈华新 70

反帝爱国百岁老人马相伯

韩希愈 119

国宝——记甲骨学家胡厚宣

祝敏申 126

我印象中之康有为

李可良 178

{传记} 读《张居正大传》随记

振如 172

{书评} 一本介绍徐悲鸿一生的传记文学

李荣胜 175

难对付的谈判者

〔美〕包瑞德 158

郭沫若与内山完造

邓牛顿 陈嘉冠 149

记新西兰司宾塞大夫在山丹

吕宛如 153

{滴水集} 夏衍造新字(77) 要说好处,“我看只有一条”(189)

冯契谈著书的原则(189) 彭德怀的“一月一省吾身”

(189) 曾联松设计国旗(189) 滑稽戏的“八字忌”

(190) 《王贵与李香香》的原名(190)

田豫告老

林石 187

红薯县官

何光岳 176

板桥用印

凌士欣 79

读者·作者·编者

191

卡尔·马克思(木刻)

王炜(封四)

108869

人物 双月刊

著名经济学家孙冶方

邓加荣 3

探索对虾奥秘的人

刘元林 18

“香”情

沈夕春 吴志峰 38

“人梯”颂

王安 141

{ 人物信箱 } 一九五五年授衔的上将简介

135

将军笔下的革命春秋

姚远方 44

——杨成武和他的战争纪实文

徐老的“诗教”

冯资荣 55

写在烟盒纸上的诗

——访廖沫沙同志



33

{ 橄欖果 } 马克思说过

201551454

78

魂归中华

——记恭美女画家杨令弟

商一仁 89

嘎伦—叛军司令—政协委员

——拉鲁·才旺多吉

袁自力 郑慧新 刘济民 57

{ 求真 }

李贺的《高轩过》不是七岁时作

{ 小集 }

容闳是第一个留学生吗?

140

赵丹的新疆之行

王为 112

我的生命在舞台上(续)

陈素真 100

{ 怀 }

忆胡子婴同志

冯和法 26

{ 念 }

马寅初校长二三事

梦 184

{ 集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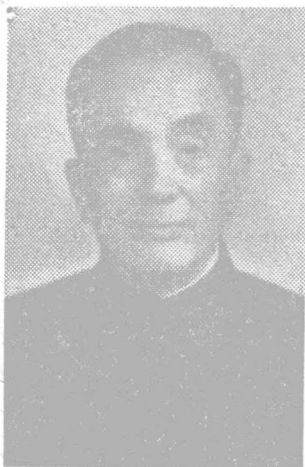
先父许寿裳的晚年岁月

许世玮 80

许寿裳先生的侧影	李霁野	85
{书简} 顾颉刚给女儿顾颉的信		74
独创手写杂志的廖平子	陈华新	70
反帝爱国百岁老人马相伯	韩希愈	119
国宝——记甲骨学家胡厚宣	祝敏申	126
我印象中之康有为	李可良	178
{传记} 读《张居正大传》随记	振如	172
{书评} 一本介绍徐悲鸿一生的传记文学	李荣胜	175
难对付的谈判者	[美]包瑞德	158
郭沫若与内山完造	邓牛顿 陈嘉冠	149
记新西兰司宾塞大夫在山丹	吕宛如	153
{滴水集} 夏衍造新字(77) 要说好处,“我看只有一条”(189)		
{滴水集} 冯契谈著书的原则(189) 彭德怀的“一月一省吾身”(189)		
{滴水集} 曾联松设计国旗(189) 滑稽戏的“八字忌”(190)		
{滴水集} 《王贵与李香香》的原名(190)		
田豫告老	林石	187
红薯县官	何光岳	176
板桥用印	凌士欣	79
读者·作者·编者		191
卡尔·马克思(木刻)	王炜(封四)	

著名经济学家孙冶方

邓加荣



这篇文章，值得一读。在这里，我们不但将看到一个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理论联系实际的良好学风和坚持真理，勇于创新的气魄，而且将看到一个模范共产党员虽历尽坎坷而对共产主义事业却无限忠诚，“虽九死其犹未悔”的伟大精神。这是无论与经济学和经济工作是否有关的同志都可以从中得到启发的。

——编者

孙冶方一生走过的路，象许许多多革命者所走过的路一样，充满着艰辛和曲折；同时，也象许许多多骨气的学者那样，充满着为探索真理、维护真理而勇于献身的精神。

一、革命之路

孙冶方本姓薛，学名萼果，1908年生于江苏无锡附近的一个小镇——玉祁镇，同我国另一位著名经济学家薛暮桥是远房的同宗兄弟。他的父亲是无锡纺织厂里的一名职员，收入微薄，家境贫

寒，孙冶方依靠亲戚朋友的资助，才勉强读了几年书。他聪颖好学，少年时代便关心社会，关心时局，要求进步，1923年在家乡读小学时就参加了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二年又由我党早期著名革命活动家俞秀松介绍，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并担任了中共无锡县党支部书记。他向中央写的支部工作汇报提纲，至今保存在革命历史档案馆里。

1924年秋，他考进无锡工商中学，一边从事学生运动，一边用心钻研经济学，从此，他的命运便紧密地与经济学联系在一起，一直在经济学的各种范畴的研究和运用之中度过了一生。

1925年10月下旬，一艘装煤的货轮由上海开往苏联海参崴，临起碇时有三十来个中国人乘小船赶至吴淞口，并在那里登上了这艘货轮。他们是我党派往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的学员，其中有张闻天、王稼祥、乌兰夫、伍修权、杨放之、刘少文、沈泽民、李培之等同志。年仅十七岁的孙冶方也在里面。1927年，孙冶方毕业于莫斯科中山大学后，到莫斯科东方大学担任政治经济学这门课程的翻译。当时讲课的是列昂节夫等著名经济学家，这对于他后来在这门科学上进行深邃的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文化大革命”期间，有人说孙冶方当年是追随王明的，这完全是无稽之谈。事实恰恰相反，他因不满王明等人的宗派主义作风，曾深受他们的迫害。那时，他因担任翻译工作每月领有固定工资，许多中国留学生常到他的宿舍里，让他拿钱请客做点家乡菜给大家改善改善生活。一个星期天的中午，他的屋里又挤满了人，大家正在热闹谈笑时，一个中山大学的中国留学生从窗口经过，听见满屋子都是江浙口音。不久，这件事传到王明等人那里，一个耸人听闻的“江浙同乡会”反党集团便被有枝有叶地铺展开了，对他们进行了批判与围攻，一直闹到要给他们严厉的党纪处分的地步。后来，中共中央代表团去莫斯科时，专门审理了此案，才算为他们平了反。但是王明等人并不就此罢休，后来还是

找了个借口，又对他进行打击报复。

1930年他由苏联回国，在上海人力车工会从事工运工作。为了深入到工人中间去，他自己也拉人力车。“九一八事变”后，他接受史沫特莱主编的《中国论坛报》的聘请，担任专门撰稿人，将他所搜集到的中国工人阶级生活状况，特别是遭受剥削压迫最深的包身工的生活状况，连续写了许多篇深刻动人的通讯，在社会上影响很大。有一次，他在外滩邮局门口等待与一位中共地下党员接头时，突然为敌人所捕获，押到监狱里关了七天七夜。他在狱中十分镇定，坦然自若，敌人用尽各种办法也拷问不出一半点口供来。由于查不出任何实证，最后只得让他找个铺保将他释放了。

后来，他在上海遇到了前北京大学教授、地下党员陈翰笙博士。当时，陈翰笙同志正利用社会科学研究所所长的合法身份，组织人力开展中国农村经济的调查研究工作，用广大农村的现实资料，来说明我国农村仍然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性质，说明农村中的经济破产和阶级分化的形势非常尖锐和激化，以批判托陈取消派散布的反动观点。孙冶方方便参加了这项很有意义的工作。这项工作是从农业经济比较发达的无锡开始的，因为托派有个理论叫作“江南无封建”，意思是那里早已是资本主义社会了。就在这项工作中，孙冶方结识了薛暮桥、钱俊瑞、王寅生、骆耕漠、徐雪寒、狄超白等人。他们的调查材料由陈翰笙指导进行加工整理，先后出版了《现今中国的土地问题》《亩的差异》和《无锡农村经济调查资料》等专著，并且写出了大量的文章，发表在国内外各种报刊杂志上。

孙冶方不仅参加了江苏、广东等地农村经济调查，而且就这些调查资料，运用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进行分析，写出了《农村经济的对象》《论农村调查中农户分类方法》和《私有、村有、国有？》等有份量的文章，有力地批驳了托派分子否定中国革命反帝

反封建性质的谬论。这些文章在社会上影响很大，孙冶方的名字也就从这时候起，逐渐地为革命的人们所熟悉，也逐渐引起敌人的注意。

抗战爆发后，组织上决定让他留在上海担任地下党文委书记，负责领导左联、社联、剧联、美联、学联、教联等工作，广泛发动各界爱国人士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他自己一面仍在为新知书店翻译书稿。1940年秋他根据组织决定去延安，途经重庆时见到了周恩来同志。早在莫斯科时，周恩来同志曾作为中共中央代表团负责人听取了孙冶方等人关于所谓“江浙同乡会”反党案件的申诉，为他们平了反。因此，他对周恩来同志的印象是非常深刻的。这次在山城重逢，感到格外亲切。周副主席告诉他：“现在情况很紧张，去延安只有一班飞机了。如果你坐上去，别人就得留下来！你看怎么办？”最后用商量的口气问他愿否去新四军。那时正是皖南事变后不久，新四军很需要人。

孙冶方当即接受周恩来同志指示，又绕行万里回到了上海，并通过地下交通线的协助到苏北找到了新四军。当天，担任华中局书记兼新四军政委的刘少奇同志就找他谈了话，详细地给他介绍了根据地的武装斗争和政权建设同白区地下党的工作的不同内容与不同方式，并分配他先后在华中局宣传部和党校工作。他在党校里工作负责，教课认真，受到学员们的好评。当时环境非常艰苦，白天，他随着部队行军，常常是在行军路上构思好讲课的内容，一驻下来，就将背包翻过来放到膝头上，编写已经构思好的教材，随后便去给学员们讲课。

在他准备讲《方法与理论》一章时，碰到了一个自己感到没有把握的问题，便向华中局书记刘少奇同志写了一封信。他在信中说：“我在读了列宁的《做什么》以后，觉得在中国党的历史上虽不曾有过象俄国《工人事务报》派那种公开反对用革命理论教育工人队伍的思潮，但根据我的切身感受，觉得在陈独秀等机会主义路

线统治下轻视理论教育的倾向还是有的。联想到我在莫斯科中山大学读书时，中共旅莫支部负责人任卓宣(叶青)等就是反对学生学习理论的。谁要埋头读书，就赐以‘学院派’的美名。”最后他问少奇同志：“我不知道当时陈独秀、彭述之等机会主义领导者本人，对此问题发表的意见如何？”

信是1941年7月13日发出的，少奇同志当天就回了一封长达三千多字的信，在信中肯定地说：“你的意见是对的。中国党内最初的一个时期——陈独秀时代及其以后——有些党员是有一种意见，反对党员对理论作比较深入的专门的研究。……结果，阻止了党内理论水平的提高。这是必须纠正与反对的。”这封复信发表在华中局的内部刊物《真理》第二期上，因为孙冶方在新四军工作时的名字叫宋亮，因此这封信的题目标为《答宋亮同志》。解放战争时期，在华东书局出版的刘少奇《论党》的那本书里，即附了《答宋亮同志》一文以及孙冶方的原信。

抗战胜利后，苏皖解放区为了要同上海打通经济上的联系，决定成立货物管理局，让孙冶方担任局长。他通过商人和许多地下关系，从上海购进了大量的布匹、药品和五金交电器材，有力地支援了人民解放战争。解放大上海时，他随军南下参加了接管工作，担任华东军政委员会重工业处处长，负责接管敌伪和国民党官僚资本的重工业企业。后来，担任华东行政委员会工业部副部长、统计局长。1954年调到北京，任国家统计局副局长。1957年后调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任代理所长和所长。

二、治学之路

恩格斯曾经说过：“要明确地懂得理论，最好的道路就是从本身的错误中、‘从亲身经历的痛苦经验中’学习。”^①

① 《马克思恩格斯书信选集》第440页。

孙冶方从事经济学研究有他自己的特点，那就是在实际部门工作中不忘理论思维，在研究部门工作中不忘密切联系实际。

还在他当统计局副局长的时候，他就深深地感到我们的计划、统计和财经管理体制上存在着不少的问题；而对于这些问题，经济学界中又流行着不谙事实、不合逻辑的格式化的解释。

某船厂为一主顾修理两条大船，修理中要换掉百分之八、九十的钢板和百分之五十的角铁，船的修理费几乎等于买一条新船。船的性能又很差，远远落后于当时的世界水平。这种船，在日本早就当废铁拆卖了，可是船主却坚持要花大价钱修出一个崭新的老古董来。原因是财政上规定只能作大修理处理，不能折旧更新。

国营企业的产品强调计划调拨，每年开一次物资调拨会议，吵吵嚷嚷，一吵半个来月，但也不能把供销之间的关系全都平衡下来，还得让购销人员满天飞地去找寻或推销物资。

企业的权利限制得太死。企业的利润和折旧费全部上缴财政，而它们所需的开支，包括扩大再生产与简单再生产两个部分，事无巨细都要经过主管部门批准。一个企业，上上下下婆婆特别多，打油买醋都要受人管，这怎么能调动起它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呢？

在计划与统计工作中，长期以来只是着重于抓产量指标而不重视价值指标，只注意使用价值而不注意价值。因为根据传统的看法，人们一向认为价值规律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是互相排斥的。

对于现实中的这些问题，必须认真地进行理论上的探索和实践上的正确解决。

1956年他以统计局副局长的身份，带领一个代表团去苏联考察。他不仅去了解苏联的现行财经管理制度是怎样做的，更注意了解他们为什么这样做，他们是怎样在十月革命后逐步形成这个制度的。他还专门请教了一些持不同观点的经济学家，细心地倾

听了他们的意见。

经过长期的探索和考察，他对有些问题看得更清楚了：我们财经管理制度上的一些做法，或者说是一些学法（因为建国初期我们的这些做法都是从苏联学过来的），确实存在着机械繁琐、生搬硬套的毛病。我们经济工作中的那些不灵活、不协调、不讲究经济效果的做法，就在于我们对于它的客观规律性还缺乏深刻的认识，还没有从自在走向自觉，从必然走向自由。

调到经济研究所之后，他进一步加强了对于这些问题的探讨与研究。为了能够密切联系实际，他主动地向上级请示，要求将经济研究所划归国家计委与中宣部双重领导，他自己仍然兼任统计局副局长，列席计委党组会议。

在这期间，他又深入到基层做了许多周密细致的调查工作。1958年他到了一个地区，见到有人热衷于小高炉，完全不计成本地大炼钢铁，就问：“你们这是为了啥？”有人说：“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追求的是使用价值，而不是价值。只要有了钢，亏损或盈利都无关紧要！”他毫不避讳地说：“这是偏见！社会主义绝不是不讲价值。忽视价值，是三十年代苏联经济学界的自然经济论的流毒。到了五十年代初，斯大林已经注意纠正了这个问题。”

他看到许多部门不根据具体情况，一味强调内地基地的新而全，盲目地将沿海一些企业迁到内地，结果打乱了原来的协作关系，破坏了原来基地的技术力量和生产能力。他又毫不避讳地说：“这种搬迁，是豆腐搬成个肉价钱，得不偿失，既失地利又违人和，是很不经济的！”

1959年他去农村调查，看到了大办食堂的一些弊病。此事涉及到人民公社“一大二公”的优越性问题，许多人闭口不谈，而他却毫无顾忌地发表了自己的意见。后来在他的支持下，经济研究所的同志将调查研究的情况向中央写了一个报告，建议取消集体食堂。这份报告由他转上去，中央采纳了他们的意见。

1961年，正是把价值、利润、奖金、企业自治当作修正主义东西大肆批判的时候，孙冶方本着理论工作者的严肃态度和共产党员的责任心，将他七、八年来凭着一个学者和经济工作者双重身份所观察到的一些问题，写成了《关于全民所有制经济内部的财经制度问题》和《关于等价交换原则和价格政策》等研究报告，一份份地呈递上去。他在这些报告中直截了当地说：“我是为企业请命，为利润恢复名誉的。企业是社会财富生产的基层单位，应当把简单再生产范围内的事情，全部下放给企业，只有充分发挥企业的积极性和主动性，生产才能搞好。”“利润，在价格能够正确反映每种产品价值的前提下，是反映企业经营好坏的综合指标。掌握了利润指标，就好象牵住了牛鼻子，其它指标好比牛腿也就跟着走了。现在人们都不敢讲利润，怕戴修正主义帽子，其实列宁早就讲过，社会主义也要讲利润，没有利润，哪里有钱去扩大生产和改善人民生活呢？”

三、坎坷之路

在历史上，有人曾经只是说出了几句简单的真理：地球绕着太阳旋转，而不是太阳绕着地球旋转，便惨遭横祸；而他孙冶方，也只是说了几句今天看来完全是经济学的常识问题，便受到了可以说不比哥白尼和伽里略稍微轻一些的罪与罚。

当他刚刚把这些报告打上去之后，就遭到康生的恶毒指责：“小小的一个经济所长，竟敢鼓吹利润挂帅！”于是在1964年，康生、陈伯达便给他定下个经济学界“最大的修正主义者”的罪名，进行了长达三十九次的围攻批判，最后撤职罢官，赶到农村里去参加“四清”运动。

在十年浩劫期间，他的处境就更进一步恶化了。不仅被揪来揪去，当“修正主义分子”进行批斗，而且在1968年5月又锒铛入狱，在牢房里关押了七年之久。

还在罢官之前，他就着手写一部《社会主义经济论》的书。那是1959年底，少奇同志找了一些经济理论工作者到家里去，交谈关于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方面的意见。少奇同志说：“政治经济学是党纲的理论基础。恩格斯说过，无产阶级政党的全部理论内容是从研究政治经济学产生的。取得政权之后，不少同志放松了对政治经济学理论的研究，习惯于靠行政命令办事，这是很不对的！”根据这些话的启示，孙冶方便与经济研究所内几个同志一道，起草了一个大纲，并写出了几篇初稿。但是那点刚露头的苗苗在1964年的围剿中早给踩烂了。后来大动乱的日子，哪里容得他放下一张平静的桌子。现在，虽然没有桌子，却有了足够的平静；没有纸和笔，却有了足够的时间。幽暗的牢房为他提供了让人无法思议的创作条件。他就在铁窗下面用腹稿的形式，将那部著作从头至尾“写”了一遍。全书共有二十二章，一百八十三节，一百余万字。

从古至今，从结绳记事到拼音文字，有谁用过这种方法写过这样大部头的学术著作呢？他必须把经济领域内浩瀚无边的事与理，一字一句地刻写在脑子里。那真是难呀！一章有分析、有见解、有情趣的腹稿写完，再去构思下一章时，前边已经做好的文章会全部不翼而飞了！怎么办呢？重新再作第二遍。第二遍忘了再作第三遍。这一部书，他前前后后共“写”了八十五遍。这是何等惊人的毅力！古往今来，有过这样的著作家吗？

1971年林彪自我爆炸后，他在狱中的境况稍微改善了一点，伙食标准提高了一些，允许家属探监看望，最难得的是允许看马列主义书籍。从此，他的狱中课业就更忙了，连蹲桶出恭时也要捧着书看。眼睛看昏了，思考麻木了，就停下来打一通太极拳。为了能够活着出去，把一肚子腹稿变成手稿，完成辩护真理的使命，他非常注意身体。每顿饭都要认真地吃，一块窝头、一片菜叶都要细细地咀嚼，取尽其中的全部养份。每次放风，他都

尽快地走出去，为了能够多沐浴一点阳光，多吸一口新鲜空气。

在他的枕上放着一部《资本论》，这是一本奇特的书。在书的重要章节、段落和警句旁边，有指甲刻划的各种符号：直线和曲线，两道杠和三道杠，夹角形和三角形，感叹号和疑问号。在书的上部有用包糖纸、草纸、商品标签和塑料布头做成的书签，而且书签的形状与摆放的位置与方式各不相同，花花绿绿，琳琅满目。这些书签和符号包含着内容极其丰富的摘要、联想、随感与心得体会，是一本只有他自己才能看懂的读书笔记。

经济学家被囚禁着。孙冶方和他的经济理论所遭到的不幸，也正是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所遭到的不幸。在铁窗外面，充斥着的是林彪、江青之流祸国殃民的“经济学”。在孙冶方的利润观点一次次遭到批判的时候，正是许多企业不敢抓利润、国家亏损越来越严重的时候；他的把计划和统计工作放在价值规律基础上的观点一次次遭到批判的时候，正是我国国民经济受到客观经济规律严重惩罚、临近崩溃边缘的时候。铁窗内外的经济学，都在经受着客观实践的检验。

与此同时，地球却在椭圆形轨道上无声无息地运行了七圈。老妻几次来监狱里探视，见他瘦骨嶙峋，容颜枯槁，禁不住落下伤心之泪。他虽然也为老妻一个人孤苦无依、凄惶愁苦的生活而忧虑，见面时却总是尽量找些话语来安慰她，从来不露出一丝酸楚，更没有流过一滴眼泪。死，并不可怕。但可惜的是自己的经济学不能成书，正确的观点不能让世人知道，真理的火焰被窒息在囚室里。应当怎样在死去之前，把自己的见解留下来呢？哪怕是现在不能问世，留待来者也好呀！但是这一切，怕只能是眼空血泪、梦断关山了！

然而，一个意想不到的机会被他巧妙地抓住了。一天，有人让他写份交待和证明材料。他便主动对监狱长说：“我写的这个材料非常重要，你要多给我几张纸，时间要长一些！”他得到纸和笔

后，便俯在床铺上唰唰不停地写起来。他在《我与经济学界的争论》的总标题下，详尽地叙述了这些年来他不避风险据理力争的一些观点。他说，这些观点虽然被人们当作邪说，斥为修正主义货色，但是他坚定不移地相信，实践将会证明哪是真正具有价值与使用价值的科学箴言，正象历史最后终于证明哥白尼的太阳中心说是千真万确的真理一样。

他把十张纸写完了，又要来十张；一个期限满了，又延长了，一个期限。就这样，他从早到晚俯在床铺上足足写了一个多月，一份三万多字的科学遗言终于写成了。正当他在稿子下边端端正正签上自己的名字时，监狱长愠怒地走过来，一把将稿子抢走，咔嚓一声给锁到铁皮箱子里去。而那正是孙冶方所期望贮存的地方。

四、反 正 之 路

“最好是把真理比做燧石，——它受到的敲打越厉害，发射出的光辉就越灿烂。”^①

1975年4月，他被从监狱里释放出来。一下车，就对接他的人们说：“我是一不改志，二不改行，三不改变观点。”回到家里不久，上边又来了新的布置，让他写份材料正确解决“三对待”问题。他挥笔立就地写道：“个人的恩怨我从不计较，理论上的是非一定要弄清，符合真理的观点一个也不放弃。”

他的身体衰弱极了，肝区和胃部都患有重病，但他仍然一刻不停地看书与写作。他对于“四人帮”一伙肆意歪曲马列主义原著的事愤恨极了。于是，便潜心地阅读原著，并把被他们所歪曲了的地方一条条地列出来，指给来看望他的人们看。在那乌云压城、寒夜无声的时候，人们对他的所做所为，无不担心而又敬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69页。

佩。

粉碎“四人帮”后，他的境遇好起来，一个有见解、有骨气的经济学家应当得到的荣誉与尊敬，回到了他的身边。多少年来他以身相许、以血力争的经济学观点，逐渐地为人们所理解，所接受，并在四化建设中发挥着作用。他的某些观点也得到国外的重视，有的国家根据他的观点进行经济改革，收到了良好的效果。他们在对外介绍经验时说：“我们现在的经济管理体制，同中国的孙冶方二十多年前所说的主张是一样的。”

组织上考虑给他安排个所长的职务，他说：“我当一个普通的研究员就行了，让年轻人来干吧！”后来组织上安排他当社会科学院兼经济研究所的顾问，他笑着说：“这个职衔好！顾问顾问，顾得上就问，顾不上就不问！”

1979年，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他的《社会主义经济的若干理论问题》一书。这是根据文革前《红旗》杂志社出版的《内部未定稿》翻印的，当时是作为批判材料而编印的。孙冶方在《前言》中说：“如果陈伯达不把我的文章当作‘批判材料’在《内部未定稿》登出来，那么我的其它许多研究报告和未发表的文稿，也许都被销毁了”，“这正是所谓‘因祸得福’”。

不幸的是，他的身体终因长期坐牢备遭摧残而酿成了不治之症，1979年冬经过医生会诊后给他动了手术。术后，他的精神一直很好，仍然一如既往，朝夕勤奋地攻读与写作。他常常是以坚忍配合医治，以工作调节疗养，用坚强的毅力来争夺更多的有效时间。他每天总是一推开饭碗就坐在写字台前，象春蚕吐丝似地将狱中打好的腹稿一句句地吐出来，顺理成章地铺陈到纸上。他知道时间对于自己是何等的宝贵，应当赶紧把那部《社会主义经济论》写出来，也算对于经济学界做了一点贡献。然而现实中的许多问题，特别是我国国民经济当前改革与调整中的许多问题，一直紧紧地系住他的思维。他常说：“如果对于这些问题不写出文